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636-03

# 法国近代早期地方赋税体制研究综述

熊 芳 芳

[摘 要] 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对近代早期法国赋税问题的研究长期局限于国家和制度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财政史和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共同推进下,近代早期赋税体制及其实践成为西方学者尤为关注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 法国;近代早期;赋税体制

[中图分类号] K56 [文献标识码] A

赋税制度史研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对赋税体制进行单纯制度上的考察反映的始终是上层统治者在理论上的构想,其实践是否有效则不得而知。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法国从“司法国家”转变为所谓的“财政国家”,伴随着近代赋税体制的形成及其向地方的渗透,王权和地方势力的斡旋主要通过对税收的争夺和对赋税体制的控制体现出来,作为“中枢神经”的赋税成为近代早期法国中央王权和地方势力相互掣肘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对于这一问题除了可以作制度上的探究外,还可以将“眼光向下”,对近代早期法国赋税体制在省级和地方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考察,这是近十年西方学者尤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与地方基层联系最为紧密的直接税体制。安托万·福兰(Antoine Follain)指出,如果不了解作为“近代国家重要基石”的直接税<sup>①</sup>的历史,也就无法了解国家史和社会史,“除了税收外,没有任何其他外部因素能对乡村生活、农业生产、社会关系,以及乡村、市镇的居民共同体之运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sup>②</sup>

近代早期论及赋税问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17、18世纪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如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斯密等人均从农业或经济发展的角度剖析过赋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显然他们重在理论分析而非现实描述。18、19世纪有关旧制度赋税问题的著作多为赋税改革方案、资料汇编或税收理论的阐述,很少谈及赋税体制的具体实施情况。埃德蒙·埃斯莫南(Edmond Esmonin)曾遗憾地指出,“所有最近的著作,很少有例外,都满足于复述、甚至剽窃17和18世纪的著述;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150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进步。”<sup>[1]</sup>(序言第6页)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稍有起色。1882年卡勒里(Alphonse Gallery)发表《17、18世纪的达依税历史》(Histoire de la taille aux XVII<sup>e</sup> et XVIII<sup>e</sup> siècles)一文,马里翁(Marcel Marion)于1901年和1910年相继出版他的两本代表作《18世纪的收入税》(L'impôt sur le revenu au XVIII<sup>e</sup> siècle)和《旧制度的直接税》(Les impôts directs sous l'Ancien Régime),他们均侧重从制度史和财政史的角度对18世纪到大革命之前出台的新税和财政改革措施进行研究。实际上,对赋税制度及其影响的地方性研究是由埃斯莫南首先开创的。埃斯莫南于1913年出版的《1661—1683年科尔贝时期诺曼底的达依税》(La Taille en Normandie au temps de Colbert)提供了一个地方赋税体制研究的范式<sup>[2]</sup>(第7页)。他对科尔贝当政期间改革税制时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在诺曼底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论及达依税从中央到地方的下派过程,诺曼底地区的估税和征税原则以及征税的过程,并分析了经济因素、个人品质以及社会关系对赋税体制的影响。埃斯莫南的研究深入到堂区层面,无疑是对局限于从制度和财政史层面探讨赋税问题的重大突破,因而被奉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尽管埃斯莫南热切希望其他学者能进一步拓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但自其著作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近代早期地方赋税体制的研究基本被“遗忘”。财政制度史家主要关注的仍然是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财税改革及新设立的直接税的实施情况。作为经济社会史分支的乡村史研究偶尔会与地方税制擦边。著名乡村史家圣雅各布(Pierre de Saint Jacob)在其《勃艮第北部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1960)一书中曾论及勃艮第地区的赋税,但他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领主捐税而不是王室赋税上。让·雅卡尔(Jean Jacquart)在

《法兰西岛的农业危机》(La crise rurale en Ile-de-France, 1550—1670, 1974)中对16、17世纪该地区直接税及农民的税负<sup>③</sup>问题略有探讨。此外,对这一主题的回避还体现在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不足。圣雅各布在1962年出版了17世纪至大革命之前有关勃艮第居民共同体的文献汇编(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communauté villageoise en Bourgogne),其中有些与地方赋税问题相关,但这些文献在此后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利用<sup>21</sup>(第10页)。这一状况与年鉴学派经济社会史的兴起,对传统政治史、财政制度史的排斥不无关系。

70年代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相关成果仍是寥寥可数,且多出自其它国家的法国史专家。美国历史学家柯林斯(James-B. Collins)在1988年出版的《绝对主义的财政限制》(Fiscal limits of Absolutism: Direct Tax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一书从14—17世纪法国税制的沿革入手,详细论述了16世纪晚期17世纪上半期法国赋税体制的演变及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乡村基层的税收实践并未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相反,国家不得不经常借助于其它手段,如借款来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威廉·贝克(William Beik)在《17世纪法国的绝对主义与社会》(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1985)一书中对近代早期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的税制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朗格多克的税制是建立在国王与地方精英阶层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希基(Daniel Hickey)于1986年出版《法国绝对主义的确立:1540—1640多菲内的税收改革斗争》(The coming of French Absolutism: the Struggle for the Tax Reform in the Province of Dauphiné, 1540—1640)一书,探讨17世纪多菲内的税制从属人税转变为属物税过程中地方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所谓“绝对主义”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王权与地方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总体上,受西方修正史学的影响,英语国家的学者侧重通过对地方赋税体制的考察透视近代早期法国所谓“绝对主义”王权的实质。

从传统财政史研究来看,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史的复兴,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所提出的“财政国家”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作得以问世,如德塞尔(Daniel Dessert)的《大世纪的钱、权力和社会》(Argent, pouvoir et société au Grand siècle, 1984),巴亚尔(Françoise Bayard)的《17世纪财政官的世界》(Le monde des financiers au XVII<sup>e</sup> siècle, 1988),菲利普·阿蒙(Philippe Hamon)的《国王的钱财: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财政》(L'Argent du roi. Les finances de François I<sup>er</sup>, 1994),以及图泽里(Mireille Touzery)的《收入税的创立:税率型达依税》(L'Invention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La taille tarifée, 1715—1789, 1994)等。

总体而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学者仍侧重于“财政国家”史的研究,对赋税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赋税与政府及王室财政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国家税制的形成、演变及其上层实践,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国家的历史及其作用、君主制下的中央财政机构、国家对财政经济干预的性质等,并未将国家、社会和普通民众联系起来,赋税体制如何运行以及普通百姓如何被剥夺的具体情况则被束之高阁。即便是费利克斯在1997年出版的《旧制度时期的经济和财政:研究指南》(Économie et finances sous l'Ancien Régime. Guide du chercheur, 1523—1789)也并未涉及地方和乡村层面的税制研究。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经济社会史亦从未将赋税问题看作独立的研究主题,税收只是作为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一个因素被谈论,而真正能反映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税收实践则几乎被忽略。法国的财政制度史家极力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划清界限,不愿“屈尊”降至地方层面;而经济社会史家则将赋税问题看作传统财政制度史的主题,摒弃于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之外,结果无论是上层的国家财政史还是下层的区域经济社会史都将地方赋税研究搁置起来。

地方赋税体制研究这一主题的真正诞生得益于法国财政史和乡村史研究的不断拓展。1986年法国财经部创立“法国经济财政史委员会”(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目的在于促进对中世纪以来法国在经济、货币和财政演变中国家作用的研究。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定期召开财经史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系列财经史专著和论文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视角逐渐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国家转向地方和乡村。1996年贝尔西(Bercy)会议讨论旧制度时期中央一级的财政管理,1998年贝尔西会议的主题集中于对省级财政管理的探讨。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著名财政史专家米歇尔·莫里诺(Michel Morineau)提出应与传统的财政制度史划清界限,进行地方研究的计划,建议对纳税人个体、税收官和普通纳税人之间的关系,税负的高低及民众的纳税能力等进行考察<sup>21</sup>(第11-12页),其建议引起一批学者的共鸣。1999年贝尔西会议的主题是对1998年主题的延续,讨论国王的省级代理人如何确保财政的正常运转及财政收入的供给等问题。这次会议的主角是王室财政官,不过也有学者探讨地方层面的课税问题,如布吕内(Michel Brunet)对18世纪鲁西永地区居民共同体在征税实践中与国家之间对立关系的考察,安托万·福兰对16、17世纪乡村中达依税税基的确立及征税方式的考察等<sup>22</sup>(第12页)。2000年12月的贝尔西会议将视角真正降到乡村一级,主要讨论乡村中的货币、交换和信贷问题。由于税收与货币关系紧密,与会者也探讨了乡村基层的征税实践及乡村中的货币资金与王室赋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与此同时,乡村史研究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遭遇了赋税问题,并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1995年至2000年,法

国诺曼底卡昂大学的“乡村社会和空间中心”发起重现下诺曼底奥吉地区自古以来的土地及其利用情况的集体和跨学科调查,主要对该地区的农民和土地、农业的改造、人口运动等进行考察<sup>31</sup>(第 380-381 页)。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史家们开始重视王室赋税与乡村社会的多重关系。他们发现,税收是推进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纳税者为了避免往往逃向赋税较轻的村庄或者城市;赋税的征收受到乡村社会开放程度的影响,在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中征税可能产生更多的纠纷和矛盾,而在流动性较大、农业发展较快的环境中这种矛盾则相对缓和;赋税还是解释乡村中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适度的税负可能强化乡村纳税人之间的凝聚力,而过度课税则有损于这种团结,这种情况在税负快速增长的 17 世纪尤其严峻<sup>32</sup>(第 381-382 页)。1998 年由法国“乡村社会史协会”主办的昂热(Angers)学术会议主题为“乡村中的钱: 13—18 世纪的地方税制”(L'Argent des villages, Comptabilités paroissiales et communales, Fiscalité locale du XIII<sup>e</sup> au XVIII<sup>e</sup> siècle),着重探讨堂区和乡村共同体的财税收支问题,学者们在王室赋税对省、地区和乡村的多重影响上达成共识,认同地方赋税体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此,国家财政史与经济社会史研究产生了一个重合的主题,即地方赋税体制研究,并吸引了相关领域历史学家的共同关注。在 2000 年出版昂热会议论文集之际,福兰和其他学者提出了一个对“17 世纪法国的达依税及其对等物”进行区域研究的计划,作为对莫里诺在 1998 年贝尔西会议中所提出问题的回应。此后,福兰等人将这一研究计划的时段向前延伸到 16 世纪甚至 15 世纪下半期,并成立了专门的“维拉内尔—乡村史协会”,协会网站<sup>④</sup>对与之相关的原始资料和研究状况等进行整理并及时通告,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法国经济财政史委员会”则走得更远,它对中世纪至 20 世纪国家的赋税体制及实践都表现出了兴趣,比如 2000 年贝尔西会议讨论 12—16 世纪初法国的公共赋税与领主捐税,2001 年会议探讨 19—20 世纪法国的赋税体制。

2000 年发起的对地方赋税体制进行集体研究的计划在 2002 年 12 月的贝尔西会议中成为正式的主题,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于 2005 年结集成册出版,名为《乡村税收: 所谓现代国家的脆弱基石》(L'impôt des campagnes. Fragile fondement de l'État dit moderne, XV<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该论文集由福兰和拉尔吉耶(Gilbert Larguier)共同主编,收录了 13 篇文章,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中 8 篇文章侧重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角度考察中世纪至 18 世纪法国赋税体制的变革及其向省级和地方渗透的过程。另外 5 篇文章则侧重考察地方基层如何为君主和政府提供税收,即直接税在堂区和乡村一级的具体运行情况,包括税额的确定、估税的方式、征税的过程及其对地方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此外,作为地方赋税体制研究计划的起点,编者还对法国各个地区的相关原始资料状况进行了梳理,并附上了 29 份 16 至 18 世纪与直接税相关的地方文献。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近五年相关的区域性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事隔 90 多年,地方赋税这一主题被重新挖掘出来,有关地方和乡村赋税体制的区域研究得以全面展开。研究者将财政制度史、经济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史相结合,突破了单纯探讨赋税制度及其经济影响的思维定势,力图在考察地方赋税体制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赋税与近代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

#### 注 释:

- ① 1789 年之前法国的直接税主要是“达依税”(taille),或译为“人头税”、“军役税”,一般分为属人税(taille personnelle)和属物税(taille réelle)。前者以个人财产和收入为课税标准;后者以土地为课税标准。
- ② “达依税及其对等物”(La taille et ses équivalents)研究计划介绍: [http://umb-www-01.ustrasbg.fr/villanelle/TAILLE-EQUIV/Le\\_programme/presentation\\_du\\_programme.htm](http://umb-www-01.ustrasbg.fr/villanelle/TAILLE-EQUIV/Le_programme/presentation_du_programme.htm), 2008-11-10。
- ③ 税负即纳税人实际承受的税收负担。
- ④ 协会网站: <http://umb-www-01.ustrasbg.fr/villanelle/index.htm>。

#### [参 考 文 献]

- [1] Esmonin, Edmond. 1913. *La Taille en Normandie au temps de Colbert (1661—1683)*.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 C<sup>ie</sup>.
- [2] Follain, Antoine et Larguier, Gilbert. 2005. “L'État moderne et l'impôt des campagnes: Rapport introductif,” in *L'impôt des campagnes. Fragile fondement de l'État dit moderne (XV<sup>e</sup>-XVIII<sup>e</sup> siècle)*. Paris: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 [3] Follain, Antoine et Larguier, Gilbert. 2003. “La taille et ses équivalents de la fin du Moyen Age au XVII<sup>e</sup> siècle. Programme de recherche ‘L'Impôt au village fragile fondement de l'État (dit) moderne’”, *Études et documents* N<sup>o</sup> XII.